

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共八大确立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最年轻的两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共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和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应该说，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是各自有特点的。邓小平可称为“举重若轻”——不惧风险和压力，敢于抓住机遇，突破开拓，格言是“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可为“举轻若重”——见微知著，长于治理，善于交换、比较、反复，格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两人的经济主张也有侧重点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反映了事物的两重性，形成了“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的局面。

一、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仅存的两人，通过抵制“两个凡是”在全党取得了众望所归的地位。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呼吁让邓小平复出，尽管发言未能写入简报，但已经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邓小平和李先念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陈云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主要分管政法和纪律。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始于1979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

1978年6月，出国和在港澳考察的三个经济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了国外日新月异情况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后，极大地激发了中央领导层的热情，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进行高速建设。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建设速度问题。会议总结报告号召，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规模，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1]。

陈云对这个大引进计划有保留意见。7月31日，他向主持务虚会的李先念建议，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2]。他专门找有关人说，引进资金那么多，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配套资金吗？[3]但是，由于陈云尚未进入中央决策层，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五点意见。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他提醒大家要清醒，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4]。

陈云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本赞成建设速度快些、规模大些的邓小平的注意，重新考虑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规模的想法。

1979年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等谈话，再次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他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5]。

更重要的一步是，邓小平又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并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

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搞现代化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只看到可以借款，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7]。

邓小平十分支持陈云的调整意见。3月23日他讲话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8]。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开始国民经济调整。但是由于党内认识不一致，争论很大。9月，陈云将财政部整理的《关于1950年—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本建设的资料》印发中央负责人。材料指出，建国以来历次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是出在基本建设超过了财力、物力，大上大下，情况一好就折腾等[9]。陈云在中央会议上重申，经济调整是必要的。一是不能靠赤字搞建设，二是利用外资的可能是有限的。象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等那样大的工程，每个五年计划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陈云总结说，我们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0]。

1980年3月，邓小平对陈云的“不再折腾”给予高度评价说：陈云同志出了个题目，就是积累和消费保持什么比例。过去的教训是超过了，总以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年底，他又决定性地表态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11]

同时，邓小平认识调整的侧重点与陈云又有所不同。关于发展速度，他说：“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调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如果到1982年、1983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账。”关于利用外资，邓小平赞成陈云的利用外资要有限度的考虑，也赞成陈云的意见，对引进项目要一个一个具体研究，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他又指出，外资“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2]。



而陈云在领导调整工作中，也注意遵循邓小平“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的长远战略。从日本引进资金和技术设备建设宝钢，是当时 22 个大引进项目中最大的，占当年签订引进资金的 60%。1978 年为宝钢建设已经追加投资十几亿元，是上马还是下马？为了补救宝钢仓促上马的不足，陈云反复三次考虑。第一次，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第二次，他到上海听汇报后，担心单靠现有技术上去，想设备全部进口，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他离开上海时，又认为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的意见办[13]。1979 年 9 月，中央同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的报告：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这样，在调整中对外引进仍有发展，避免了一些经济损失。

事实上，邓小平也在陈云的“自由外汇不足”的考虑之外，开辟了一个“善于利用外资”新思路。他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较快见效，解决好偿还能力问题。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14]。当时，22 个大引进项目中的仪征化纤工程被调整下马后，因国内确实急需，有关部门心有不甘，继续探索新办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找到邓小平，在他的支持下，1981 年通过在日本发行 100 亿日元债券，分别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主要装置及技术，使工程 1982 年 1 月开工，1984 年第一套生产装置就投产。此次集资被称为“仪征模式”，开创了国家重大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境外发债的先例。

在邓小平、陈云领导下，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得以坚决实施，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为以后几十年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邓、陈相辅相成的领导机制，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邓小平与陈云若干经济思想侧重点的比较

（一）关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

邓小平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他晚年总结的“上新台阶”飞跃思想

1991 年 8 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十年说：“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15]

1992 年 1-2 月，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谈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



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6]

由上看，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要抓住有利机遇，进行跳跃式的发展，不能过于求稳。用技术语言表达，是一波飞跃后，进行平台整理，再继续下一波飞跃。总体是均值快速提升的一条波浪式斜线。

陈云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他建国以来一贯强调的“综合平衡”

1、建设规模与国力要平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是他“综合平衡”思想的主线。他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 [17] 2、部门、行业之间要平衡，包括计划与市场，农、轻、重，财政支出和收入，进口与出口，中央与地方，货币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等。3、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要平衡。他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 [18] 这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制定建设方针的基本考虑。4、长线 with 短线要平衡。长线就是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短线指年度计划。陈云主张短线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平衡”。他主张：“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19]。

总结起来，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中的特点是：1、平衡是积极的平衡，“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 [20]。也就是说，平衡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停滞。平衡要造成紧张、持续的状态，发挥最大效益。2、“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就是高速度。1979年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21]

在稳定和发展之间，陈云比较注意稳定。他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22] 用技术语言表达，陈云主张经济发展应当尽可能做到起伏不要大，是一条平稳向上的斜线。

怎样理解邓、陈两人的不同侧重点呢？我认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两人的主张，反映了国家经济建设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建国的前三十年，是打基础的时期，综合国力比较低，抗御风险能力不强，国际环境也比较严峻，长期面临封锁，后来基本没有外援。这样，任何大的经济起伏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强调稳和平衡，是正确的方针。陈云讲平衡最多的三个时期，一是1957年，“大跃进”冒头；二是1962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局面；三是1979年，追求高指标又超过国家承受能力。因此，他是有针对性的。



而邓小平强调不断“上新台阶”，是在经过前三十年建设，国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承受一定风险的时候。面临国际环境相对缓和，世界进入新科技飞跃时期，如果不以超常速度发展，中国将难以赶上世界水平。所以强调打破稳字，高速度发展，是主观允许和客观需要的方针。1984年至1988年上了一个新台阶，1989年起用三年治理整顿；1992年至1994年又上了个新台阶，1995年起用两年宏观调控。都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说明是可行的。

2、两人的主张都不是片面的，而是有重点的两点论。邓小平的“上新台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3]。跳跃也不是无休止的连续跳跃。上一个台阶，再调整一下，调整就是平衡阶段。总体上看是包括着平衡的，可以叫作均线平衡。陈云的平衡是积极的，不是停滞僵化的，长期积极平衡才能保证高速度。他强调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而是通过市场调节，在解决暴露矛盾中有变化的。

3、邓小平的“上新台阶”，是指的一定发展时期。他说：“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至于稳，“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24]。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抓住时机、快速发展是主要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讲求持续平衡发展，应该是主要趋势。中共十七大将“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又快又好”的口号改为科学发展、又好又快的方针，就是两者的共同体现。

（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邓小平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更不是市场经济。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突破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同样，西方经济学也一直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征来确认。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提出了质疑：“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5]应该说，当时的市场经济，实质还是商品经济，指的是市场调节。但是，邓小平的质疑，拓宽了人们的思路，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



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26] 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又突破性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27]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28] 根据他的意见，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

陈云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是80年代提出的“鸟笼经济”关系

应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陈云比邓小平提出得要早一些。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29]。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为了刺激经济快速恢复，曾经大力借助商品经济手段，如搞了高档商品的高价出售，使货币快速回笼；更为大胆的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条都是对计划经济的“离经叛道”。因此，他遭到严厉批判，长期被斥为“老右”。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正是汲取陈云要用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进行大补充的意见，在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 [30]。

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陈云却多次提醒注意计划的作用——“鸟笼经济”关系。

1982年12月，陈云借用黄克诚的“鸟笼”比喻阐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搞活。这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当然，‘笼子’的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要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 [31]

如何看待邓、陈在这个问题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呢？可以这样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邓小平针对过去的计划经济脱离市场需要的弊病，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这是一个伟大的开拓，不仅具有经济战略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创新。没有这个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充满活力，就不能在全球经济的新局面下取得立足之地和胜利。邓小平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而陈云的“鸟笼经济”，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和保障。1、他的“鸟笼”，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一个随着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甚至“可以跨国跨洲”，这自然包括着市场经济的含义，不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2、陈云的“鸟笼”，是针对80年代搞活中出现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情况而发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确实随时需要一个“鸟笼”，为“搞活”加上一个“不乱”的安全阀。3、历史证明，无论叫计划还是规划，或者叫国家干预，“鸟笼”是客观存在的。1992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初，在执行中产生了投资放贷过大、开发区泛滥、下岗职工急速增多、假冒伪劣横行等等弊病，正是1995年开始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才解决了这些负面影响。同样，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完全搞新自由主义的放任导致的。而美国采取的国家接管“房地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等房产、金融、保险机构做法，也证明，即使在把市场经济奉为圣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鸟飞远了也是要抓回来关在笼中的。

三、从邓、陈一毛、周关系的比较看领导机制

邓小平、陈云这一对人物，与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对人物的关系十分相似。毛、邓是最终的战略设计和决策者；周、陈既是参与决策者，更是执行和管理者。毛、邓勇于大刀阔斧的宏观开拓，周、陈更善于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管理。

但是，毛、周的领导机制却没有完全得到邓、陈那样的相辅相成效果。如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反对“冒进”，但以后两年却连续遭到严厉批判，终于导致了“大跃进”失败的严重后果。其原因在于当时党的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个人决断，使毛、周领导机制最后只有单补的一定作用，更没有制约的作用，最终单补作用也因为缺乏制约而失效，变成事后的补救作用。1962年陈云主持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与1979年他主持的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在已经出现巨大经济损失下的挽救危机，十分被动；后者则因邓小平的支持，能在热浪方兴时紧急刹车，成为以后经济飞跃的准备阶段。

邓、陈领导机制能够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首先在于，通过总结“文革”教训，由邓小平倡导，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邓小平尊重和信任陈云这位党内经济大管家的见解和能力，亲自提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陈云也首先提出并完全拥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军地位。1989年5月国家发生动乱之际，陈云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32]

其次，邓、陈领导机制的成功，不仅因为两人互相尊重的品格和作风，更因为两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着实事求是的共同基础。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应当走什么样发展道路、现代化目标是什么样的，即对中国特色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发展道路，1979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今后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这样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33]。这和陈云基本建设要适应综合国力，积累率不能过高，要适当减少重工业投资、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现代化目标，1979年3月，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34]。同月，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设计了中国式的小康社会目标。这和陈云关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搞现代化不能起点过高、避免欲速则不达的“再折腾”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他们的合力，使得党和国家出现了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三十年居于世界第一。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能够有这样两位领袖掌舵，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和机遇。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

[1]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9月9日。

[2]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3] 《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15页。

[4] 《陈云年谱》下卷，第229页。

[5] 《陈云年谱》下卷，第233页。

[6]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

[7] 《陈云年谱》下卷，第240-242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2页。

[9] 《陈云年谱》下卷，第250页。

[10] 《陈云年谱》下卷，第250-252页。



- [11] 《陈云年谱》下卷，第 257、266 页。
-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7-199 页。
- [13] 《陈云年谱》下卷，第 247 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8-199 页。
-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8、369 页。
-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377 页。
- [17]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 页。
- [18]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9 页。
- [19]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11、55 页。
- [20]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56 页。
- [21]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48 页。
- [22]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48、279 页。
-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
- [2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 页。
- [2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
-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1 页。
-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3 页。
- [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 [29]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13 页。
- [30]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2 页。
- [31] 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党的文献》2000 年第 3 期；《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320 页。
- [32]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368 页。



[33]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6 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1 页。

